

明朝的钱

去哪儿了



反观大分流
同期的
中国实际

绘制现代
财政国家的
路线图

大明帝国的
财政崩溃
与商人命运

华腾达◎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朝的钱去哪儿了：大明帝国的财政崩溃与商人命运 / 华腾达著. —上

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23

(财政政治学视界论丛)

ISBN 978-7-5476-1951-3

I. ①明… II. ①华… III. ①财政史—中国—明代

IV. ①F812.948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187548 号

责任编辑 陈占宏

封面设计 刘 斌

本书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明朝的钱去哪儿了

大明帝国的财政崩溃与商人命运

华腾达 著

出 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C 座)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62,000

版 次 202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6-1951-3/F·720

定 价 78.00 元

卷首语

在策划“财政政治学译丛”“财政政治学文丛”时，我们产生了要编辑出版《财政政治的视界》文集的初步设想。“译丛”主要出版的是国外学者的专著和已出版的论文集，“文丛”主要出版的是国内学者的专著。可是，仍有大量有价值的国内外文文献因各种原因无法被纳入“译丛”或“文丛”中，因而需要有一个新的载体作为“译丛”和“文丛”的有效补充。现在，在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作为“文丛”的续编，“财政政治学视界论丛”也开始出版了，于是我们将已经筹备了几年的《财政政治的视界》纳入“论丛”中，这也算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期望《财政政治的视界》系列图书能成为国内学界翻译、传播、交流、研讨财政政治学的新平台。

正如“财政政治学视界论丛”的“主编后记”所阐明的，我们推动财政政治学发展的努力，主要是希望继承和拓展在财政思想史上被忽略或被边缘化的一种研究传统。这种研究传统在文献上既体现在各类专著中，也体现在大量分散在各类甚至是各个学科的学术期刊中。这些研究跨越了多个世纪，来源于不同的语种和国家，涉及不同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甚至可能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学术思想史上还同时得到过极高或极低的评价。在我们看来，这些研究共享了一种“视界”，它不同于在社会控制取向下计算资源配置最优或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财政经济学研究，而是在个体自由取向下努力揭示财政制度形式与国家治理、社会变迁之间的深层内在联系。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此并不希望给“财政政治的视界”进行严格的界定，我们所说的“视界”并没有库恩所说的“范式”或拉卡托斯所说的“科学研究纲领”那样严格。

在《财政政治的视界》系列图书选译(编)的论文中，大家会看到有很多学者在研究中使用的是“财政社会学”而非“财政政治学”，但这并非是我们“移花接木”或“张冠李戴”，而是从创立者的意图和所使用的方法来说，二者在很多场合下可以

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财政政治学文丛”的“文丛后记”中，我们曾简要地阐述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而在“财政政治学视界论丛”的“主编后记”中，我们也重申并补充了有关观点。我们选择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来看待“财政社会学”和“财政政治学”，希望基于财政的维度来理解、解释和识别大规模的国家治理变革与社会变迁，同时进一步分析和理解形成特定财政制度的社会条件以及特定财政制度怎样塑造社会条件。

我们期望《财政政治的视界》系列图书能过一段时间出版一辑。本辑《财政政治的视界》选录的文献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在财政政治学/财政社会学发展史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文(译文)，本辑来源主要是英语文献，我们希望今后能有更多来自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日语等多语种文献的译文；二是对于财政政治学/财政社会学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的选文，它们大多来自外文专著，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或不便将全书译为中文，我们就选择其中具有重要理论探索意义并有相对独立性的篇章翻译后编入；三是国内学者在财政政治学/财政社会学领域具有创新性的论文或对财政政治学/财政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启发的文献综述。

感谢学界同仁和社会各界人士对我们编辑出版的“财政政治学译丛”“财政政治学文丛”“中国近现代财政学名作新编丛书”的大力支持，也衷心期待以《财政政治的视界：缘起与发展》为开篇的“财政政治学视界论丛”能得到学界同仁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指导。

目 录

绪论	1
----------	---

“李约瑟之问”等问题都好奇为什么在大分流之后中国和西方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那无疑,一国的财政制度以及商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其中是占有不少分量的。

一、为什么研究大明帝国的财政?	3
-----------------------	---

二、相关研究概述	6
----------------	---

三、内容框架和研究方法	11
-------------------	----

第一章 明代的财政制度和商业环境	19
------------------------	----

公共品如道路网和驿站的建设,民用只是其次的。其最主要的目的,仍然是服务国家和国家财政。明代中后期,频频出现财政危机,张居正是借此节省开支,改革后全国邮驿经费减少了三分之一。

一、明代的政治制度	21
-----------------	----

二、明代的财政制度	26
-----------------	----

三、明代的商业环境	33
-----------------	----

四、纵横向比较	47
---------------	----

第二章 明代国营专卖中的财政与商人	59
-------------------------	----

明帝国商人在国家与商人的合作中的地位仍然不高。在看似其角色必不可少的表象之下,明朝商人的存在完全是为帝国财政服务。而且,商人的命运牢牢掌握在当时掌管国家财政的官员手中。

一、明代关于国营垄断和商人的财政观点	62
--------------------------	----

二、明代商人与国家的合作：以食盐贸易为例…… 72

三、明代食盐专卖：财政观点…… 78

四、附论：明廷对商人的利用…… 85

第三章 明代商业税中的财政与商人 93

明初洪武帝和永乐帝创造的一些用于打击逃税的创新举措收效甚微，以至于到了明中，商人的逃税现象日益猖獗，而且很多基层的税收官员也并不作为。明朝末期，万历帝的矿税和加派税吏，以及之后魏阉集团的政策，短暂地增加了明廷的财政收入，却让商人怨声载道。

一、明代的商业税征收与商人…… 96

二、明初的商业税…… 98

三、明中期的商业税…… 101

四、明末的商业税…… 105

第四章 明代农业税和非税收入中的财政与商人 113

商人的地位虽然仍远不及士阶层，但和固守土地的农民和难以创收的工匠相比，明帝国商人的地位是有所提高的。功成名就的商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大量购置土地，并发挥和乡绅类似的职能，甚至成为乡绅，为村民们修建祠堂、改善基建等，从而在自己的家乡和老乡中博得好名声。

一、明代农业税收与农商关系…… 116

二、明代土地交易与商人…… 128

三、明代其他非税收入与士商关系…… 133

四、附论：明代的士农工商关系…… 140

第五章 明代对外商贸活动中的财政与商人 147

利用外贸发展沿海经济，开拓海外市场，在贸易上补短板，被认为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思考的出发点并不是站在维护商人权益的角度。

一、明代关于对外商贸的财政观点…… 150

二、明代对外贸易的财政收入与商人…… 162

第六章 明代对内商业活动中的财政与商人 181

明代徽州商人在其经济活动中,可能除了盐业之外,也就是典当业占有着重要地位。他们经营的质库、当铺,遍布各地,并以此盘剥重息,累积财富。

- 一、明代国家和商人的高利贷活动 184
- 二、明代商人的消费与国家财政 193
- 三、明代皇室内府的商业活动与国家财政 205

结语 明代的财政与商人 215

对于国家财政而言,商人兼具“贡献者”和“参与分配者”两个身份,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和士人阶层一样具有相当的话语权。

- 一、明代财政制度: 商人视角 218
- 二、结语: 大分流视角下的明代财政和商人 225

参考文献 232

绪论



“李约瑟之问”等问题都好奇为什么在大分流之后中国和西方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那无疑，一国的财政制度以及商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其中是占有不少分量的。而明代所处的时期，即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中叶，恰恰正是大分流发生之时。具体细致地研究明帝国时期独特的财政政策 and 制度，以及商人在其中的角色和地位，对于理解大分流这一段世界近代史上的特殊却极其重要的时期里中国的财政状况和商人角色，具有重要意义。

一、为什么研究大明帝国的财政？

（一）反观大分流同期的中国实际

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序言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怎样……在3至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李约瑟的提问是从科技史的角度出发，好奇为何中国古代的科技理论很薄弱，为何能在古代创造出众多伟大的科技成果，但在坐拥这些极重要科技成果的同时却又在近代落后于西方。而更进一步，我们也不禁想要追问，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同时期的中国发生？

自这一问题提出伊始，众多的学者对此提出了各种解释，比如可能是所有解释里最出名的彭慕兰的《大分流》，就是比较了工业革命前夕东亚和欧洲的经济状况，并以当时的江南地区和英格兰的比较举例^[1]。不过，无论是何种解释，科技的飞升与工业革命的推进总离不开一个因素：原始积累。而这正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毫无疑问，财政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虽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然而其

重要性却毋庸置疑,对明帝国来说亦是如此。从财政上看,“帝国依托于君主的土地所有权建立统治权,用君主对个人及家族的关心,激励并约束他为公共利益而治理天下的行为”^[2]。

选择明代这个时间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明代和 15 至 17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基本处于同期,而我们都知,欧洲的原始积累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对外扩张。一些学者喜欢对中国与欧洲在财政制度上的异同进行分析。这个研究思路无疑是合理的,对明代财政制度的讨论亦是本书的核心内容。不过,在财政制度之外,很多学者的分析却鲜少或根本没有涉及商人这一重要的群体,或许商人阶层历来都不是财政史研究关心的主要群体。在近代欧洲的发展史上,商人的地位是绝对不容小觑的。那个时期的欧洲商人有权放贷给国王,能支持国家出兵与外国打仗或进行殖民侵略,亦有相当多的创新,比如现代商业法律雏形的创立,现代公司制度的建立,银行的创建,汇票、信用等新型金融工具的出现等等。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商人还能直接接管国家财政,比如在拜占庭帝国后期,中央政府由于缺少资金,直接把国家重大项目的专营权和税收权都交给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威尼斯商人。

反观大分流同期的明帝国,总体上,之前的不少学者均认同明帝国财政趋于僵化,而明代的商人群体毫无话语权。从当时中西方大分流的结果来看,这一论断应该是有其一定合理性的。然而,我们肯定不能只得出这么一个“单一性论断”。很多研究中所体现的思想桎梏是颇为根深蒂固的,“一些人一直以来被灌输的观念,受到的教育就是,明代统治者如何残暴荒淫,如何横征暴敛,广大民众被沉重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教科书上是这么写的,一些历史学者的文章专著中也是这么宣扬的”^[3]。这种质疑是合理的:明帝国是否真的只是皇帝一人独大的专制?明帝国的统治阶层是否真的“残暴荒淫”?明代的财政制度是否真的僵化?即使真的是僵化,其原因是否是财政制度本身的设计缺陷,执行不力,还是有其他因素?明代的商人群体是否仍然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的话语权是否随着明代商业发展而有所改变?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在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之前,都是无法妄下结论的。

而在这一系列问题中,本研究最关心的是:明代的财政制度与明代商人的社会角色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两者如何互相影响?明代商人为明代国家财政作出了怎样的贡献?他们在其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书将详细解答这些问题。

（二）探究商人与国家财政的关系

但凡与史学有关的研究，我们不免想问一句：这研究对我们当下有怎样的意义？任何有趣的研究，往往亦有其较为丰富的现实意义。本书亦不例外。本研究虽然立足于几百年前的明代财政制度和商业发展，着重于明代商人在国家财政中的角色和地位，但对于当下仍然有较为丰富的现实意义。

第一，对于明代商人与国家财政的深入研究，有助于还原更真实的历史，破除一些固有的成见。从上述比较中可以看出，从横向来看，一国的财政制度和政策对商人角色的影响巨大，与明朝商人相比，同时期的欧洲商人所面对的财政制度，即使不是大相径庭，也至少是颇为不同的。相应的，明帝国商人在财政活动中发挥的角色也颇为不同的，但这种不同并非简单地归结于明帝国闭关锁国或者明代商人缺乏欧洲商人那样的开拓和创新精神这样的单一因素。而从纵向来看，与之前的先秦时期以及秦汉伊始的专制王朝，以及明之后的清朝相比，明帝国商人所面临的财政制度和政策以及国内外的经济环境等，均有较大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很大的不同，因而绝不能想当然地将明代商人笼统地纳入“受到专制皇权压迫的中国古代商人”的范畴中。明帝国仍然是专制皇权，但是如果对财政史和商业史的全面考察，明代商人在国家财政中的具体作用和地位，是很容易与其他朝代混淆的。

第二，具体细致地研究明帝国时期独特的财政政策和制度，以及商人在其中的角色和地位，有助于理解大分流这一段世界近代史上的特殊却极其重要的时期里中国的财政状况和商人角色。“李约瑟之问”等问题都好奇为什么在大分流之后中国和西方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那无疑，一国的财政制度以及商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占有不少分量的。而本研究选取的明帝国，即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恰恰正是大分流发生之时。因而本研究不仅具有财政史或商业史上的意义，对于理解大分流前后中西方发展的路径异同，以及理解当今一些国家经历的财政变革，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历史或许经常展现其惊人的相似，本研究对于当今的商人与国家财政的现状亦有一定的借鉴或警示作用。无论是国营专卖，还是各类税收，还是对外贸易，或是商人的消费，甚至是依然存在的商人高利贷行为等，其实都可以在几百年前的明帝国找到其踪迹。“学而优则仕”的古训依然是商人培养子女的金科玉

律,文化程度可能不是很高的第一代商人在积攒了一定的财富之后,将其中一部分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这与明帝国也是何其相似。而明帝国士人阶层与商人阶层的关系,与今日的政商关系可能亦有一些共通之处。

二、相关研究概述

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对明代财政史和商业史做了很多研究工作。这里先就之前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做一个简述。

(一) 明代财政史研究

明代财政史领域的主要著作和近年的学术论文大致归纳如下。首先是对明代财政史的综合研究。黄仁宇先生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可谓研究明代财政的著作中最为声名远播的一本。它以明实录、明人奏疏笔记、明代地方志等史料为基础,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黄仁宇先生作为对明代财政政策作全面阐述的第一代学者,对许多新发现的细节性材料进行了全面的历史性透视。表面强大的明帝国实际没有足够的财力完成它该肩负的职责,而中央集权的政制更是提高了改革的门槛。其著作明确地点出了明代财政制度的根本问题,对有明一代的财政和政治之影响以及明代财政制度对后世的正面和负面遗产。不过,该书所提的范围实际上包括整个明代,因而其实无需在书名中强调 16 世纪,这一提法我认为可能是黄仁宇先生为了迎合当时西方学界对晚明的偏好。

在明代财政系统性的论述方面,张建民、周荣对整个明朝财政进行了系统化的整理,包括鱼鳞图册的绘制、地籍制度的建立、明朝财政管理体系、中央财政管理机构、地方财政管理机构、明代漕运制度等^[4]。刘守刚致力于运用财政政治学理论来重新阐释自商周直至当代的财政史料,从而以财政的视角揭示中华国家的发展规律,通过将财政思想演变与财政制度实践有机地交融在一起,揭示千百年来中国人用财政工具治理国家的秘密以及向现代转型的艰难路径。其中,第十至十二讲探讨了包含明帝国的“第三帝国”的财政史^[5]。张守军从中国古代的赋税与劳役的角度,详细论述了明代的田赋和一条鞭法,盐税、酒税、矿税、茶税等具体

的细分工商杂税,劳役及其向货币税的转变等^[6]。边俊杰则主要研究了明代的财政制度变迁,包括明代财政制度变迁的背景、过程、效应、成因以及启示和教训。该研究结合明代的“历史周期率”,系统论述了明代财政制度由好变坏、由建立到崩溃的全过程。然后以“民生”思想和“三个有利于”作为评价标准,深入分析了明代财政制度变迁的效应和成因,指出了明代财政制度崩溃的财政文化、政治集团等方面的诱导因素,并总结了财政制度建设的一些经验^[7]。

而在明代边防、军屯与财政关系的研究方面,赖建诚从边镇粮饷的角度探讨了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在汗牛充栋的明代史料中,赖建诚挑选出五份史料,全面评估明朝在1531—1602年间北方边防部队的兵力(士兵及牲口数目)、粮饷以及中央白银拨款以倍数剧增的情形。该研究通过分析明代史料中连篇累牍的数据重构明代财政内的北部边防开支状况,以此论述十六世纪明朝北部边防的军事财政状况、提出非常全面而具体的分析^[8]。赵龙则是以《明史·食货志》、《明实录》为主要材料,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梳理明代屯田事业的兴衰,考察屯田与财政、军事的关系,认为以屯田为代表的财政从世宗一朝开始逐渐崩坏,是明代实际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不是以往论者所谓“明之亡,实亡于万历”^[9]。

在对明代矿税问题的研究方面,近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皇帝、阁臣和宦官在这一问题的立场和互相制约或利益分配上。例如,宋立杰重点研究了万历年间的阁臣如沈一贯对矿税持反对态度,然而阁臣对皇权具有绝对的附属性,在这种形势的支配下,他没有采取强谏的方式,而是委婉劝谏,适度地提议修改矿税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并没有促使万历皇帝废除矿税^[10]。方兴则对万历年间的“矿税银两”经历从无序的“摊派”到有序的“定额”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一方面,在皇帝与宦官之间达成了“分成”的默契,而另一方面,“有序”和“定额”是相对的,无序的摊派一直没有停止,而矿监税使及其随从所获取的银两是难以估算的^[11]。

而在对明代内库的最新研究方面,苏新红以太仓库收支制度的演变为主线,对明代内库,皇室财政与国家公共财政的关系,中央财政制度,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屯田、盐法等北边军镇军饷供应制度,田赋、徭役等税收征收体系与白银、纸钞货币制度的关系等进行研究,动态呈现明代财政制度从初期到末期的整体演变^[12]。宋瑞通过分析明代内库的基本情况,如内库的收支与人员构成,基于明代的不同时期探讨了内库中皇室财政与国家公共财政的地位变化。透过内库演变

的视角,理解传统财政的公私走向,也透过该视角研究明代皇室财政与一国国运兴衰的关系以及对国运兴衰的影响^[13]。

近年来在明代财政史领域亦有一些视角比较新颖的研究。比如,周荣的研究认为明代财政和“僧政”的关系十分密切,从财政赋役状况出发透视“僧政”是一个新颖的视角,反之亦然。朝廷的敕谕、诏令等官方文献所反映的主要是明初财政和佛教政策制定时的理念和条文,民间赋役文书则能直观真实地反映朝廷政策在基层社会实施的情形^[14]。姜瑞雯对明代的丝绢税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一条鞭法改革中以人丁、田地为征收对象的丝绢税项分别与徭役、田赋项目归并核算进行了展开论述^[15]。赵中男亦另辟蹊径研究了弘治年间对藩王的赏赐,认为其数量之大是明帝国历朝所罕见的,而大量的赏赐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被大量侵夺。针对藩王赏赐产生的财政问题,明廷想出一些办法和措施给予补救,但成效甚微。因此,该研究认为弘治时期是明代国家财政状况恶化的重要转折点,藩王赏赐活动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尤其是财政问题,是国家隐患和社会危机的重要标志之一,故而该研究对“弘治中兴”持怀疑态度^[16]。

西方学界研究明史的学者不少,但专门研究明代财政的著作较为罕见。Chou, Chin-sheng and Edward, H. Kaplan 是在西方学术界较早系统地论述古代中国经济和财政的学者。他们代表作的内容不限于明代财政史,但其中就明朝的一条鞭法等部分展开了详细的论述^[17]。John Dardess 在其研究的第一章展开论述了明帝国边防和国家财政的问题,而第三章涉及了更具体的明代国家财政管理和相关政策^[18]。Richard Von Glahn 在其著作的第七和第八章就明代前期和后期的经济和财政史展开了论述。其中,作者反对对市场的过度关注而忽略创新和其他制度因素(最为明显的是国家的作用)对财政影响的观点,笔者颇为赞同。唐宋以后国家日益依赖商业等非直接税收入,明初制定的政策最终也未能扭转这一趋势。明末,税收转向白银,劳役几乎被取消,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也转变为货币交易。这两章就以上的问题展开了详细的分析^[19]。卜正明等西方明史专家,亦在其著作中多少涉及一些明代财政方面的内容,但并无整章论述,也未成体系。

明代的审计史是明代财政史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该细分领域,蒋大鸣在其著作的第五章从明帝国的盐务收支审计、黄册审计、审计法律与法规、审计的特征和局限性、皇室的财务审计等方面对明代审计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概述^[20]。李金华著作的第八章重点从明代都察院的审计职能、六科给事中的审计职能、户部的审

计职能等方面对明代审计展开了论述^[21]。方宝璋著作的第十四、十五章,则从明代监察官的兼职审计、课考官吏中的兼职审计、明代的财经监督立法等方面进行论述^[22]。

明代财政思想史是明代财政史的另一个重要分支,不过单就明朝展开的整本论著几乎没有,绝大多数都是著作的其中几个章节或一章。胡寄窗的三卷无疑是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重量级专著,其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涉及以田赋为代表的财政收入、财政监管、人口、土地、边防、货币等方面的财政思想^[23]。谈敏则对古代中国的财政思想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梳理,其中第十四和第十五章涉及丰富的明代财政思想、财政监察和审计思想,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明初的财政言论、丘濬的财政思想、张居正与一条鞭法、明代中后期的财政思想、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人的财政思想等^[24]。孙文学、王振宇、齐海鹏亦从大量的典籍资料中详细梳理了相关史料,对中国财政思想家及其主要财政思想进行总结论述。其中第二编的第九章以明朝初期、明中期和明后期作为划分来具体论述明朝的财政思想^[25]。Bertram Schefold 探讨了古典时期的全球主要经济思想,其中专门有一个章节深入分析了亚洲的财政思想,大多数篇幅是在探讨中国,另有一小部分讨论日本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其著作从一位西方学者的角度,对古代中国的财政思想作出了解读,其中明代部分对丘濬、张居正等思想家的财政理论作了展开分析^[26]。

(二) 明代商人研究

明代商人亦是中外学者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相关研究不少,但是谈及其与明代国家财政的关联的研究较为少见。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吴慧的《中国商业通史》和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吴慧的《中国商业通史》第三卷详细记述了明代的商业史,按商业的发展、商人、商业政策、商业思想等板块分章节进行论述,其中有不少部分都对商人在财政中的作用和角色有所提及。除此之外,该著作的另一大特色是就明朝时期各民族之间的贸易交往和边疆地区的商业贸易作了尽可能详细的论述^[27]。

唐力行将商人阶层视为 16 世纪以后中国社会中最为先进的一支社会力量。他们的经营活动松动着传统社会的根基,推动着传统社会的缓慢转型。该研究从商人与近世社会相互作用这一广阔视野,考察了商人在明代尤其是明代后期变革时代的特有功能。不过,唐先生作为著名的社会史学者,其论述中虽有涉及财政,

却着墨不多,更多地还是关注商人的地域分布、商人的社会生活与心态、商人与都市文化等纯社会学或社会史话题^[28]。

卜正明(Timothy Brook)、柯律格(Craig Clunas)和陆冬远(Richard Lufrano)的三本著作是西方学者研究明代商人和商业史的典范之作。卜正明利用了各种各样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材料,特别是明代地方志、商人手册、商人路程指南,让我们真切体会到当时的日常劳作、旅游、消费,也让我们看到,在明代,商人等财富新贵怎样惺惺作态,而跻身上流阶层的商人又处于怎样的焦虑状态中。他的研究还重估了明代商业的历史角色,探讨商品经济是否该为明朝的灭亡“埋单”。卜正明认为,明代各阶层的界线模糊,物质欲望膨胀,国家财政恶化,在晚明的士大夫看来,社会的种种道德堕落是商业发展造成的恶果^[29]。

Craig Clunas 详细分析了明帝国士人和商人阶层所拥有的“富余之物”(Superfluous Things),比如绘画、书法、青铜器、陶瓷、玉雕和其他物品,并详细描述了当时社会和各阶层对它们的态度,及其对国家财政的影响。他的讨论参考了现代的社会文化理论和同时期即 17、18 世纪英国关于奢侈品、炫耀性消费和日常消费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30]。

鉴于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功,越来越清楚的是,长期以来在西方学界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绊脚石”的儒家社会思想,在适当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Richard Lufrano 的研究是近期对儒学在明帝国尤其是明末商业和商人对快速发展的经济和国家财政起到的作用的重新评估中最详细和最深入的。作为明史和“中国通”学者,其对财政实践的儒家根源也有详细的论述^[31]。

(三) 本研究的创新点和目标

传统的明代财政史研究,以及传统的明代商业史研究,在学界均已有不少知名学者的集大成之作,其中一部分已经罗列在了上述的文献概述中。作为年轻学者,笔者若在任何单个领域再洋洋洒洒写一本书,不免有班门弄斧之嫌。然而,这两个领域的结合,确实是之前鲜有学者涉及的。大体上,由于学术界研究的领域日趋细分化,大家普遍认为财政史与商业史基本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然而,这种理解其实是失之偏颇的。

以古代“士农工商”的排序为例,这虽然是典型的商业史研究课题,却也完全